

林衍经 著

方志求是集

广西人民出版社



方志文库丛书
(之十)



FANGZHIWENKU

林衍经 著

方志求是集

广西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林衍经,1929年12月生,浙江省江山县人。1960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为安徽大学历史系副教授。80年代以来,先后应聘担任安徽、浙江、江西、湖南等省30多个地市县修志部门的编纂顾问;发表方志论文70余篇;出版的著作有《方志史话》、《方志学综论》和《方志学概论》(合著)、《中国地方志综览》(副主编)等。

特约编辑:郑正西

方志求是集

林衍经 著

☆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区党委凤凰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 1092 1/32 7印张 154千字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ISBN 7-219-01297-7/K·60 定价: 3.80元

自序

地方志和方志学，并称为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中的两株奇葩。千百年来，在我国民族文化的巍峨殿堂里，始终闪烁着璀璨晶莹、艳丽夺目的光彩，不仅受到我国人民的珍视，也深为世界各国有志之士所瞩目、所仰慕。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地方志和方志学象其它各项事业一样，受到了党和国家的关注和爱护，进入了发展的新时期，改革十年，地方志和方志学发展之快、成就之大，世人有目共睹，作为方志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者，我倍感振奋和欣慰。

当代修志事业的兴起，使我有机会、有可能通过社会服务，进行修志实践和与各地修志工作者接触和合作，吸收丰富的新鲜经验，选取研究的课题，探索前进的道路。与新方志编纂同步发展的方志理论研究之风的蔚然而盛，既使我受到启迪而激发起研究探微的热情，也使我的研究所得有了交流的机会。于是，也就断续地写出了数十篇粗识浅论之文来。这里结集的二十多篇，便是从中选出并作了必要的增删调整而编辑的。这二十多篇文章的写作，出自两条宗旨：一是追随新方志编纂的踪迹，从修志的客观实际需要出发，竭尽愚钝，奉献所识，以为修志服务，并借以向战斗在修志第一线、富有修志实践经验的同志求教；二是从马克思主义方志学建设的需要出发，在理论上试作一番阐幽探微的努力，在源流上试作传统和经验的发掘、总结而备继承创新之参

考。因此，选编这个集子的初衷（或许是一厢情愿的痴想）是为了体现“探新”。

当代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纂和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建设，只是社会主义方志事业的一个开端。作为一项事业来说，犹如长江黄河，是奔腾不息的。但长江黄河的万里奔流毕竟是自然现象，而社会主义方志事业却是要靠人为来推进的，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有鉴于此，所以又将所作的两篇短文附录于后，作为同青年同志交流自己学习和从事方志事业的粗浅体会，并希望有助于他们了解和热爱这项事业，甘愿为之奋斗、作出贡献。

今年，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庆。是我从旧社会苦难艰危生活中被解放出来，走上虽然曲折、但却享受着自由幸福的生活道路的四十周年。为了表达我对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祖国的敬仰和挚爱之情，我希望这本小册子能够作为一份礼物，连同我幸福欢快的心一起献给伟大的党、伟大的祖国。

今年，正巧也是我降生的六十周年。为此，也想借这本小册子留下一个生活篇章的逗号，作为小小的纪念。

前面说过，选编这个集子意在体现“探新”。探新的主旨在于“求是”。所以，也就给她起了《方志求是集》的名字。

1989年2月2日于安徽大学历史系

目 录

自 序

略论新方志学及其建设·····	(1)
试论方志学学科体系及其未来走向·····	(14)
方志学源流疏论·····	(25)
方志学爱国思想传统述论·····	(38)
《史记》与地方志·····	(47)
浅谈修志的传统和经验·····	(55)
南宋志家罗愿及其《鄂州小集》·····	(64)
罗愿《新安志》探论·····	(73)
明代地方志述议·····	(85)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修志·····	(90)
县志创新的一个核心问题·····	(95)
试论新编地方志的形质美·····	(101)
编纂新方志的哲学思考·····	(113)
新编方志时代性散议·····	(119)
简论新方志辨体·····	(126)
县志编纂的横向联系问题·····	(133)
新志体例和篇目琐议·····	(137)
方志行文议·····	(142)

方志图表议·····	(149)
新编方志胜议·····	(156)
关于饮食服务业入志问题·····	(163)
人物志撰写问题散论·····	(168)
新方志人物记载的三条建议·····	(176)
关于志稿总纂合成后的深加工问题·····	(183)
志稿评议会摭论·····	(189)
志书质量问题面面观·····	(196)

〔附录〕

一、与“长河史学社”同学谈学习方志学·····	(206)
二、在新编《玉山县志》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210)

略论新方志学及其建设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地方志和在总结修志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方志学，便是我国古代文化宝库中闪烁异彩、无比鲜艳并交相辉映的两支奇葩。现存的历代方志8500多种，亟待整理、研究，使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重要的参考作用；千余年编纂地方志的优良传统和丰富经验，亦要我们批判地继承。1980年4月，胡乔木同志在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里，明确提出了继续编写地方志的任务，指出“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继续编写地方志。”无论是整理、研究旧方志，批判地继承修志传统和经验，还是继续编写地方志，都必须有一整套符合时代要求的、严密而又科学的方志学理论、方法，指导具体实践，方期有成。因此，开展方志学的研究，进行马克思主义方志学即新方志学建设，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当务之急。

迄今为止，学界虽然开始注意了方志学的研究，但大都偏重于对旧方志学的探讨议论和对旧方志的评价阐微，或者就编纂新的省（区）、市、县志的方案提出一些意见；而对新方志学的研究，却还属漠野初垦，有待于大家辛勤耕耘，始可望硕果满园，赢得丰收。有鉴于此，谨以蠡测管窥之见，试为浅论，冀求得到教正。

一、新方志学的性质、内容和特征

顾名思义，方志学是研究、编纂地方志的一种专门学问。有人说，方志学即是方志编纂学。这话是有道理的，因为方志学研究的基本对象和内容，就是如何编写方志的问题。但考实而言，这样概括是不够全面、不够准确的；即以旧方志学而言，就不仅研究关于编写方志的方法问题，而且对方志的性质、源流和发展的历史，方志学的派别和旧志的利弊得失，以及旧志的收藏和整理等各方面的问題，也都进行过探索和总结。至于新方志学，则不但要研究如何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来编写新志的问题，还应当从时代和历史的新要求，新条件出发，研究得更广泛、更全面。那么，新方志学研究的范围和內容，除旧方志学包容的而外，还该有哪些方面的新课题呢？我认为，从目前来看，诸如旧地方志和旧方志学的继承、改造、利用问题，在修志中如何充分运用摄影、测绘等现代物质技术条件问题，怎样发挥方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问题，修志经验的总结交流问题，修志人材和方志学研究人材的培养问题，地方志编纂机构的建设和人员配备及领属关系问题，方志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及其理论、方法的引进吸收问题，等等，都是极为重要的，是旧方志学无法包容、不可企及的；不探索这些问题，就谈不上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编写地方志的问题，新方志学的“新”。就得不到明确、具体的生动体现。

内容反映实质。据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方志学是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具体而微地说，方志学既是研究、编纂地方志的一种专门学问，那么，它的性质，当然就是同地方志的科学属性紧密相关联的了。关于地方志的性质，章学诚曾反复指出：“志属信史”，①“志乃史体”，②“方志如古国史”，③“方志为国史羽翼”。④方志既属于历史学范

围，方志学之具历史学性质，自不待言了。而新史学与旧史学的本质区别，即在于新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指导，科学地阐明人类历史；新方志学作为新史学的一个部类，无疑也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作指导，编写出合乎时代需要的地方志的。

关于地方志的性质，近几年讨论中曾有种种说法，除历史上的地理书说和历史书说、亦史亦地说外，又有地方百科全书、行政管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地方信息学等各说。^⑤浅见以为：以方志发展的数量和质量的趋向而言，统论旧时方志的性质，当以归属历史学科为是；当代编纂的社会主义新方志，虽其所载具体内容和对象与旧方志相异，但同样起到“存史”、“资治”、“兴利”、“教化”等方面的作用，科学属性并没有改变，还应当属于历史学范畴，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只是已经开始偏离历史学范畴的过程、发生了向跨界学科的渐变而已。^⑥因此，作为指导编纂新方志的方志理论即马克思主义方志学，无疑也仍然是历史学性质的。

新方志学的内容和性质，决定了它所具有的某些特征。

首先，前面已经谈到，新方志学的内容，既包含了旧方志学已经确定的几个方面，又拓展了若干新的课题；这表明：新方志学是在批判地继承了旧方志学的基础上，作为我国社会科学领域内一个新的专门学科出现的。同时，它又是在马克思主义已经确定地成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⑦的历史环境中萌生的，时代赋予它新的内容和特色。关于批判地继承旧方志学的问题，本文下一节中将详为阐述；这里，只是借以说明一个问题，即：继承性是马克思主义方志学一个鲜明的特征。

其次，新方志学在学术范围中一开始出现，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基础，作为核心和灵魂的。新方志学与旧方志学的根本不同之处，即在于此。众所周知，旧方志学在阐述修志理论方面，是因其全面性、系统性、严密性见称，有很高科学性的。但是，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也确实存在一些片面、乖谬、不科学的问题。例如，章学诚关于修志要严名分、别尊卑、谨守《春秋》家法，要“有裨风教，使天地间大节大义纲常赖以扶持”^⑧等意见，就是从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利益出发，恪守封建等级制度，宣扬封建节烈观念的主张，表现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本质，在今天看来，显然是非科学的、不足为训的封建糟粕。关于“文人不可与修志”^⑨的断论，近人瞿宣颖就曾以同治十年古文家吴汝纶撰《深州风土记》为实例，盛赞其中“疆域”一篇“疏举版图分合，言皆有物，非他志蹈袭具文可比”，是“文词之美者”，“物产”一篇也“得事核词雅之长”，针对性地提出了“安见文人之必不能撰史也”^⑩的诘问。

新方志学则不同，由于它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基础的，而“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科学”，^⑪所以，便有了更全面、更系统、更严密地阐说方志理论的根本保证。新方志学的这个特点，具体地表现为：阐发议论体现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和原则，廓清唯心主义对方志学的腐蚀和影响；全面地重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和经验，强调编写地方志要客观地反映本地区自然和社会的发展史实；编写地方志的方法方面，既重视批判地继承历史上优良的史学传统，又注意因时因地

进行新的探索和创造。这样，在科学性方面，新方志学就达到了旧方志学无法达到的新的高度。

第三，旧方志学理论及其指导下的修志实践，是为封建地主阶级利益服务的。章学诚曾多次地反复强调：“夫修志者，非示观美，将求其实用也。”^⑫“学归有用”，^⑬修志时应以“经事综物，敷陈治道”的“奏议冠首”。^⑭同时，还对“徇文辞而不求实用”的做法进行了尖锐的批评。^⑮他这种修志要讲求实用的主张，是可以借鉴的。那么，怎样做到求实用呢？从取材方面讲，他主张要详近略远，采择能经世、供鉴戒者；以体例言，强调“皇恩庆典宜作纪”，^⑯突出皇帝的尊崇地位和统御作用；关于文辞，要求取法史迁，“不可专事浮文，以虚誉为事也。”^⑰并力诋文人不宜与修志。

章学诚的这些见解和主张，同他对方志性质的理解是一致的，归结到一点，就是志书要起到史鉴的作用，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可见，方志学决不是超然物外的自在体，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应当而且必然要为经济基础和当时的政治服务。新方志学是要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在这方面，无论从服务的范围还是从产生的作用来看，都比旧方志学广阔得多，全面得多，深刻得多。例如，编写方志如何全面真实地反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内容，如何整理现存的方志、使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重要的参考作用，就是新方志学所阐明的内容和为现实经济、政治服务的基本方面。1958年，周恩来同志曾指示：县志中保存了不少关于各地经济建设的有用材料，要系统地整理方志及其它书籍中有关科学技术的资料，作到“古为今用”。^⑱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为新方志学指明的一个重要任务。我国建国以来，科学研究单位和科学工作者从大量

地方志中蒐集资料，编辑编写成了《方志报矿资料》、《中国古天象纪录总表》、《五百年来我国旱、水、涝灾史料》、《方志综合资料·地方志分类资料·地方志物产》等等资料和专著，对社会主义建设起了巨大的参考作用，为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实践经验，应当整理和总结，以裨益于新方志学的理论建设，更好地指导整理方志资料的工作。总之，从新方志学的内容、任务来看，阶级性乃是它的重要特征。

第四，旧方志学，是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根据自己修方志的实践，又总结了前人修方志的成败得失，创立起来的。其后一百多年中，随着地方志纂修工作的持续进行，又不断地发展完善。旧方志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清楚地表明了它同修志实践的依存关系，即：从实践中产生，受实践检验，在实践中发展。例如，清同治十年撰成《深州风土记》的吴汝纶，就“不拘志本”，创辟了“人谱”的志篇，被誉为“网罗散逸，详而不冗，可以垂为法式”的一种体例。^①民国11年修的《宣化县志》，第五卷为《实业志》，“颇能注意社会经济状况”，^②也是因时而创的新体例。时至今日，旧中国已一去不复返，新中国正岿然屹立，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各项事业均有长足的发展，旧的方志理论在许多方面已不适于指导编写新地方志的需要，刚刚兴起的新方志学也有待在指导修志的实践中不断地发展和完备。毛泽东同志说：“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③新的方志理论，同样需要而且必然地要经历这种不断实践、认识，逐渐臻于完善的客观过程。由此可见，实践性，这是新方志学的第四个特征。

弄清楚新方志学的性质、内容和特征，是不容忽视的方志理论研究工作，对于建设新方志学，有最直接的重大意义；因为，把这些基本问题搞清楚了，才可能真正做到情况明，从而决心大、方法对地进行新方志学建设。

有人认为，方志学是发展的，不必冠以“新”字。我则认为，旧事物成为过去，新事物应运而生，这个新旧交替的发展变化，如果不用恰当的称谓加以区分，则新事物的特质便无由体现。马克思主义方志学在性质、内容和特征等基本方面既与旧方志学有根本差别，那么，以“新方志学”名之，就是必要的、恰当的了。

二、关于新方志学的建设

建设新方志学，是事关四化大业的迫切需求，也是必须长期坚持的艰巨任务。如果说编纂地方志是百年大计，那么，建设新方志学便是千秋功业。对此，无论是方志学界的老一辈方家通人，还是阅历不深、方始涉足的中青年方志研究、编纂工作者，无论是专业的方志工作者，还是其他关心它的有识之士，都有共襄大业的崇高责任和光荣义务，都应当奋然而起，勇当其任。

关于建设新方志学的问题，朱士嘉先生曾有过议论，他说：“研究方志和编修方志，有区别，又有联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从四化建设需要出发，通过认真的研究，建设马克思主义方志学，以此指导方志的编修工作。同时，编修方志的过程也是研究方志理论的过程，也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对于建设马克思主义方志学，是不可缺少的一环，而且是十分重要的一环。”^②这番话，阐明了研究方志和编修方志的区别与联系，提出了建设新方志学和编修新地方志同时并举、相互促进的意见，情真意切，十分深刻，启

人心智，发人深思。使我们懂得：既不能存有不切实际的“等新方志学建设好了，再着手修志”的消极想法，又不能只急于从事修志而忽视方志理论的研究，而必须在修志实践中建设新方志学，以方志理论研究的新成果来指导修志实践；在理论研究和修志实践中，都必须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以之作为指导思想。

具体来说，我们应当从哪些方面着手建设新方志学呢？怎样来建设新方志学呢？这里，仅就几个主要问题，谈谈我的谫陋识见。

第一，必须在批判地继承旧方志学的基础上建设新方志学。

万丈高楼平地起，没有基础的空中楼阁是不存在的。章学诚在《方志立三书议》、《州县请立志科议》和《修志十议》等著作中，“详尽地阐明了方志和方志体例的源流、特征及其地位，批评了修志的流弊，提出了搜采资料的具体措施，拟订了编修方志独特的体例，破除了方志是图经、是地理书的陈旧观念，树立了方志为一方全史，可供国史要删的新观念。”^{②③}所以梁启超说：“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②④}作为方志学奠基者的章学诚，在创立方志学的过程中，不仅依据了自己修方志的实践，也继承了前人的经验和成果。例如他作为“史家法度”提出来的方志理论，就几乎无一不是所来有自的：兼通古今、详近略远和天象、地理、纪传、礼乐、典政、食货、艺文等门类区分，严名分、别尊卑的《春秋》家法和“有裨风教”的要旨，都是以往史家和史书已经习用的；至若体例须仿马《史》、班《书》，论断宜尊史迁，文辞应取法史迁，等等，更是直接说明了继承所自的本源。可以这样说：章学诚如果不继承前人的经验和成果，就

不可能“发明义例，振起浮俗，使方志之用增其伟大”，不会有“迈越寻常者”的功绩。^{②5}直到现在，尽管物换星移，时殊势异，但学界对章学诚的方志理论，也还是基本肯定的。因此，我们应当正确地对待并且批判地继承旧方志学这份文化遗产。

所谓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就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所说的，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②6}“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而不是“无批判地兼收并蓄”。^{②7}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使古典政治经济学、古典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正是成功的杰出典范。列宁在评论马克思主义时，明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的无产阶级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②8}事实上，旧方志学中这种“有价值的东西”是很多的，可以吸收过来，作为新方志学基本的内容。关于旧方志学中可以吸收的“有价值的东西”即“精华”和应当剔除的封建性糟粕，学界在评介章学诚方志学的内容的许多论著中，已多有论列缕析，这里就不赘议了。

批判地继承旧方志学是为了建设和发展新方志学。新方志学是在批判地继承旧方志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同时，也如前所述，新方志学的建设和发展，又是通过修志实践和整理旧地方志的实践，不断地总结、研究来实现的。所以，我们从事地方志研究和编纂工作的同志，必须不断地总结自己的经验和成果，及时地进行卓有成效的交流，彼此

通力合作，坚持不懈，共同为建设和发展新方志学作出贡献。

第二，必须通过各种有效的方式，培养大批研究方志和编修方志的专门人材，作为建设新方志学的生力军。

要办好一件事，没有基本的人力是不行的。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每个县要编写出一部新的县志，全国需要的编纂人员就是一支千军万马的队伍。然而，懂得方志理论和修志工作的老一辈专家学者，已属珍数。五十年代时，有些地区虽然建立了编纂地方志的机构，开展了编修新志的工作，并取得了初步成绩，但却未进行过切实的总结、研究，经验没有整理出来，问题也没有及时解决；十年浩劫，使编纂人员横遭迫害，东离西散，各种资料也痛被毁弃，烟飞灰灭，修志工作遭到严重破坏，被迫停止。现在要普遍开展修志工作，自然会首先遇到人材奇缺的严重困难。

人材哪里来？章学诚的办法是“访能文学而通史裁者”。^②这个办法，虽然远不能满足我们今天修志人材的需要，却也不失为一个有用的主意，如果深入访求，是可以筛选到一批人材的。但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对修志人材的需求问题，还得靠上下结合、“两条腿走路”的办法来大批培养。

所谓上下结合的办法，就是由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中国地方志协会等部门和各地结合起来抓这个培养人材的工作，例如组织老专家成立教学和顾问班子，短期培训各省选送的学员；各省组织懂行的人员和任用这批经过培训的学员，充任师资，培训各地（市）、县选用的修志人员。这样做，时间短，能应用人的燃眉之急，收效较快。

所谓“两条腿走路”的办法，是指：一方面走正规的培养人材的道路，即由各高等院校历史系科开设方志学课程，